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陕北闹红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陕北闹红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3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北闹红 / 任文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4.5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046 - 9

I. ①陕… II. ①任… III. ①陕北革命根据地—史料
IV. ①K26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6464 号

陕北闹红

任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 安 雄

责任校对 谢勇蝶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046 - 9

定 价 4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 编	任 文			
编 委	薛义忠	石 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 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 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 微
	仝 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 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 17 种 21 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 年 3 月

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代前言）

梁严冰 任学岭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新发现证实，陕北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之一，曾经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近代以来，陕北人民在这片黄土地上同样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1935年2月以前，陕北存在着地域上隔绝但又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拥有一支红军，即红二十六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也拥有一支红军，即红二十七军。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这两支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统一指挥下，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后最终完成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陕北根据地还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因此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的：“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史和延安时期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论文都十分丰富，但对中央红军到来之前的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及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命根据地情况的研究却相对薄弱，^①本文意在通过对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的考察，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生、艰难曲折的发展壮大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一个观察视野。

—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陕西籍旅京学生李子洲^②、魏野畴等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假期回乡后，他们又广泛而热情地宣传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使陕北这一相对偏僻的地方，不但比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很快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党的先驱者在陕北各地积极创建党团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并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和全党一样，进入了创建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革命武装也由建立红军游击队进而形成大规模的正规红军。

当时，陕北的榆林中学和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是我党在陕北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③这两个学校之所以成为陕北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与杜斌丞和李子洲有极大的关系。在1923年前，榆林中学是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可谓陕北最高学府，从1923年起，校长杜斌丞先后从平津等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魏野畴、李子洲等来校任教。这些人来榆中后，“大胆改革，宣传民主思想，号召学生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传播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④，使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风气变得活跃起来，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

① 相关研究见：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榆林地委党史办：《马列主义在榆林中学、绥德四师的早期传播》，载《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2期。

③ 榆林地委党史办：《马列主义在榆林中学、绥德四师的早期传播》，载《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2期。

④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批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骨干，这些人以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我们党在陕北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①

1924年春，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和杜斌丞的邀请，李子洲到榆林中学任教，同年7月，李子洲又被推举为绥德四师校长，李到绥德四师后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校办学，并经常给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列著作，学校教师还与学生一起研究《共产主义ABC》《五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主张》等党的重要理论和有关时局的主张，还采用学生讲演、时事报告会、讨论会等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②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使绥德四师广大学生的政治眼界大为开阔，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心，同时也鼓舞他们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的传播，陕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再一次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故而清涧、佳县、安定、米脂、神木、府谷、吴堡、横山、保安、安边、定边等地的青年纷纷到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批初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分子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建立党团组织。1924年冬，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等在绥德四师建立起党小组，当年12月，又成立了团支部。^③之后，1925年初，瓦窑堡军队团支部在三连建立，史唯然任书记。1926年初，谢子长（时任石谦部第十二连连长）与李象九又在安定县成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陕北其他地方如定边在1926年2月成立了党支部，延安在1925年秋冬建立了团支部，1926年下半年成立了党支部，安边也于1926年10月成立了党支部。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

① 薄一波：《怀念子长》，载198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张锋等：《“谢青天”的故事》，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③ 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地区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历史文件和回忆录》，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党团组织在陕北逐渐建立起来，并积极开展革命运动。当时，陕北的学生运动在李子洲等人的领导下如火如荼，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从1927年2月起，逐渐扩展到陕北各县，先后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等，当众烧毁文契，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贫苦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赞誉谢子长为“谢青天”。^①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统一领导陕西、甘肃两省的工作和革命斗争。到1927年5月前后，陕西地区党组织发展到七个地委、三十七个特支、党员两千一百七十七人，甘肃地区有特支四个，党员三十人。^②陕北、陕甘地区的革命潮流与全国一样正日益高涨的时候，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是，该年6月前后，中共陕甘区委对时局即将发生的大转折已经有所预感，并且出席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张含辉等人又带回了武汉方面形势变化的信息，因此，陕西党组织对当时形势变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故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局面下，“陕北党组织并没有受到摧残”，“党的主观力量在全省范围陕北要算最强大”了。^③

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9月上旬，李子洲（1927年7月下旬，李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从武汉回到西安，9月26日晚到27日晚，中共陕西省委（7月11日，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子洲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议案等。省委在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军事工作，指出“在

① 张锋等：《“谢青天”的故事》，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② 《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载《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版，第18、20、23—24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1992年，第100页。

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别任务”，并进一步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①的口号，同时指出：“党应该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对党员进行军事教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②根据会议精神，陕西党组织在1927年10月和1928年发动和领导了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沉重地打击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恶气焰，同时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使他们懂得：“（甲）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单有武器没有农民不行，单有农民没有武器也不行。（乙）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争，打阵地战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盲动主义不行。”^③刘志丹、谢子长等并没有因暂时的失败而屈服，他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回到陕甘边界和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整顿地方党组织。但此时，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④，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特委委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从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利用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部队和社团进行兵运活动。刘志丹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队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随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⑤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袭击而失败。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像刘志丹后来总结的：“利用军阀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版，第8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2年版，第81页。

③ 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3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印发的高干会文献之四。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① 谢子长也认为：“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要靠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② 基于此认识，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一同回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始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③ 同时，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献传到陕北，对陕北、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和发展游击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0年12月，经陕北特委批准，刘善忠和高朗亭等集资买枪，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安定、米脂等县积极进行秘密串联，设立秘密联络站点，^④ 为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甘肃省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率领的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队部分胜利会合。是年冬，根据形势的发展该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意见，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扩大了红军，队伍迅速发

① 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延安文史第六辑·延安革命英烈》，2003年，第10页。

② 贺晋年：《回忆子长同志》，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③ 《中共中央北方局1930年10月18日对陕北特委的工作指示——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6期。

④ 高明镜（即高朗亭）：《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段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并且“帮助正宁、山水、淳化农民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帮助三原、富平、彬州、礼泉、宜君、中部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数百万……推进了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①，加之当时陕甘边地区发生连年灾荒，抢粮、分粮斗争遍及各地，民变、民暴此起彼伏，形成了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潮流。根据陕甘边地区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中共中央适应形势的发展研究了陕西特别是陕甘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适时地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两项互相联系的重要战略，即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分析了陕西形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起来”^②的实际情况，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苏维埃区”^③的任务。中央决定，按红军编制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出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④中央要求，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执行“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彻底地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⑤以建立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进一步强调要把红二十六军“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⑥。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

① 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②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28页。

③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29页。

④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30页。

⑤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31—32页。

⑥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61页。

重申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强这一工作”，“立刻成立红军一团”，“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①根据党中央的上述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相应地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具体部署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组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是“陕西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②决定在陕甘边地区组建农人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编成一团”，^③紧接着，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④《决议》还指出：“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⑤根据省委会议和《决议》精神，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于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军团两级政委。

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后，即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实施以革命武装开辟陕甘边新苏区的计划。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尽管杜衡一度在政治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红二十六军在省委的领导下，排除干扰，历经艰难险阻，开创了大块根

①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68—69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1992年，第194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1992年，第193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1992年，第443页。

⑤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1992年，第450—451页。

据地，到1933年上半年逐渐形成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起断头川、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渠源，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面积约五千平方里。^①

三

在陕甘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和红二十六军组建的同时，陕北红军游击队的组建也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基于前面提到的高朗亭和刘善忠等人在陕北各地秘密活动串联，有了相当群众基础，1932年3月，经陕北特委批准，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活动于延川、延长、清涧、安定、绥德一带。4月18日夜，游击队在二百余农民配合下，袭击延川永坪镇，全歼守镇民团，缴枪十七支。战后，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随后又于10月1日，陕北特委决定将先锋队称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九支队成立之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土豪劣绅，影响很大，轰动陕北，《大公报》声称“陕北绥德、清涧南部发现百余赤匪，为首者刘法（善）忠，高朗亭是也”^②。1933年4月7日，陕北特委又将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陕北游击队成立后，得到陕甘游击队和刘志丹的很大帮助，他们先后派史法直、强龙光、高鹏飞等人到陕北游击队，并赠送了枪支弹药，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③到6月，一支队发展到四个分队，八十余人枪。一支队的建立与发展，说明了在陕北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

①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13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三年四月—一九三六年》，1992年，第305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已基本成熟。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圪召开，此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①，决定进一步组建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北红军第一支队及其根据地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地区。此外，在清涧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木）府（谷）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地组建游击队和开创根据地。^②会后，根据会议精神，1933年8月5日，崔田民等在清涧王家山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11月7日，高朗亭、马万里等在神木县松树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这样，陕北红军游击队开辟了神府（神木和府谷）、绥清（绥德和清涧）及安定三个战略区域，陕北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的发展时期，加之谢子长于1932年底去上海中央局“受训”后，也于1934年1月回到陕北，并被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这更使陕北的红军游击队战士信心倍增，他们奔走相告：“老谢回来了，有办法了。”^③所经地区的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④谢子长回到陕北，给敌人以很大震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陕北红军的势力进一步壮大。1934年2月4日，陕北特委在佳县宣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紧接着，3月8日，在绥德县的苏家圪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鉴于红军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陕北特委于1934年4月4日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了党团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条件成熟时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到年底扩编红军一个师。于是，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总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等

① 《陕北特委工作报告》（1933年10月20日），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13期。

② 高明镜：《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段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③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王世泰：《忆子长》，载1940年2月21日《解放日报》。

人率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六百余人，一举袭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营救出许多被捕同志和红军游击队员家属，缴枪数十支。^①之后，陕北特委又于1934年7月10日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特务队，负责保卫陕北特委机关的安全和筹款集资等任务；佳县县委又组建了第六支队；7月15日，安定县又成立了陕北红军第八支队。这些游击队成立后，都积极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各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斗争。

为了进一步扩大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和加强两支红军联系，谢子长等决定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二百余人南下，7月25日到达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等老战友重逢，叙旧言欢。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黎原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和部队生活管理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华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气氛甚为热烈。刘志丹还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赠送给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批武器，对陕北游击队支援很大。^②

7月28日，谢子长带领陕北红军游击队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推举谢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县连打胜仗，粉碎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不幸负伤。10月，中共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瀚来陕北，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

① 高明镜：《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段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② 高明镜：《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段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1页。